

论职业教育政策的生态性价值取向

陶军明,刘 萍

〔摘 要〕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跨界属性决定了其利益场域的多元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因而,职业教育政策就调整的范围和对象而言,也完全突破了一般意义上教育政策“纯粹”的、“基于教育”的特点。通过对生态本体的认识以及职业教育政策本质的梳理,发现生态性是职业教育政策的固有属性之一。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利益冲突的存在,导致职业教育政策的决策空间会受到利益和价值判断的挤压与影响,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政策主体具备系统化思维,职业教育政策过程应该坚持和彰显共同体内涵的生态性价值取向。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取向意味着职业教育政策的运行应秉承动态平衡、多元共治、自我创新以及以人为本等原则。

〔关键词〕 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取向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类型教育背景下职教师生能力素质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Y23113,主持人:陶军明)

〔作者简介〕 陶军明,博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教授;(通讯作者)刘萍,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图书馆,讲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4)0019-0031-08

价值取向问题历来都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是教育政策主体基于自身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对处理教育问题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和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1]就目前来看,诸如“公共性”“教育平等”“正义”“效益优化”等,都是教育政策具有共识性意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已成为教育实践变革的引领性观念,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表明,教育政策是介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间地带,而价值观的改变则是教育政策创新的起点,这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诉求时,其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和环境日益复杂化,客观上决定了职业教育政策在调整职业教育利益的过程中,既要关照“教育

场”的学校、教师和学生等主体的利益,还要关照“职业场”的行业和企业等主体的诉求。因而,就职业教育政策调整的范围和对象而言,已经完全突破了一般意义上教育政策“纯粹”的、“基于教育”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政策在调整范围和特征上是应该区别于普通教育政策的。不论是政策的理论层面还是政策的实践层面,都需要“用系统思维下好‘职业教育一盘大棋’”。^[2]因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实践变革亟需秉持一种新的、能有效回应职业教育多元性、系统性、复杂性特征的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理念。实践地看,生态性价值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观照职业教育政策实践的新的价值追求。

新的价值观念的诞生,是同它所处的时代相匹配的,也是深刻反映时代特征与需求的。

正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的,所有的观念都必须描述为历史性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根植于时代的文化背景中,并随着人性概念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和心理的变化而改变。^[3]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转变,包括思维的转变,时代的基本问题才能被领会。因此,针对新观念的提出,有必要为其做必要的解释和辩护。

一、关于生态本体的认识

正如有论者断言,生态是21世纪的核心话题。生态(Eco-)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指住所、房子或家务。从词源上理解,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科学。简单地说,生态的内涵是指生物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主体是生物有机体。^[4]最早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的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列(A.G. Tansley)把生物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把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以及环境诸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不仅把生态学推向系统研究的新高度,并为日后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尤其是认识和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准备。

(一)生态的特质

1. 生态存在的普遍性

人们对生态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这一概念在不同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生态具有了更宽泛的内涵和外延,赋予了生态更深层次的意蕴。生态从最初特指生物圈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拓展到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处理上,当前已被上升到人类环境和谐的层次。就生态研究的主体而言,可以是生物有机体,也可以是人类。例如,在我国,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观点也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这种对生态愿景的美好追求也使得生态概念承载了新的时代意义,已经渗透到

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生态时时处处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实践中,当然也包括职业教育政策实践。

2. 生态是一种和谐共生

生态意味着一种“关系”。离开关系,就没有生命的存在。表征着生态系统内的生态因子间的能量交换和信息传递的通畅无阻,这种关系维系着系统的平衡,使之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使得能量的交换和信息的传递成为一种阻碍,那么生态就被破坏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已由“关系论”升华为“和谐论”,提起“生态”,就意味着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意味着地球上各部分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意味着历史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5]所以,生态本身就有和谐的意蕴,和谐共生是生态的一种升华。

3. 生态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系统的特征,没有整体性,就没有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若干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每个组成部分在系统中都具有一定的功能。系统论认为,系统功能大于各组成部分之和。离开系统,单个的某一组成部分就可能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或者自身也将会失去生存的环境而走向消亡。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6]所以,生态具有的整体性客观上要求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合作与沟通,这也是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之一。

(二)作为价值的生态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工具理性价值观指引下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祛魅,人类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这一危机体现在自然世界环境的恶化和人类心灵世界对生态认知的贫瘠。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不仅需要通过环保技术改良环境,通过更严厉的立法来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唤醒人们

对现代文明和生态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生态”问题也逐渐引起哲学家的关注,生态哲学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7]为减轻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需要将生态价值的概念引入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道德应运而生,它拓展了道德的领域。传统的道德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道德则将其衍生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益被视为一种价值取向而存在,成为学术界和人们生活实践中常用的概念。

二、生态性是职业教育政策的固有属性

(一)体现类型教育特征的职业教育政策

正确认识职业教育需要树立一种新理念,即类型教育理念。2019年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8]职业教育之所以是一种类型教育,取决于其“跨界”的属性。职业教育所“跨”之“界”,突破了教育之“界”和职业之“界”。职业教育“不仅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视域,而且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境遇,还跨越了工作与学习的界域”。^[9]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就需要打破界域的藩篱和思维的定界意识。

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了其必然要面对和统筹生产与教育、学校与企业、工作与学习、知识与行动等职业教育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在客观上决定了职业教育场域中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以及职业教育政策所规制的对象和群体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例如,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政府、学校、企业、行业、教师、学生,等等。而这

些利益相关者中,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涉及对象广泛多样亦是前所未有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事业单位,还包括以牟利为导向的企业,等等,各类主体之间属性不同且复杂相异。以往职业教育政策只专注于职业教育场域中的“教育场”,注重调整和理顺有关“教育”部分的主体关系,而忽视和遗忘了关于“职业”的部分,以至于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校和企业二者之间参与职业教育的“冷热不均”,进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之间的脱节。

理论上,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在价值追求上而言,就是高质量、高效率地培养人,体现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技术技能人才上。为实现这一价值追求,则需要辅以职业教育的内外部改革。外部,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创造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内部,则需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包括教师等高质量人才以及职业学校等组织的积极性。新时代推进职业教育,亟需开创性地进行职业教育政策创新。在实践层面,职业教育政策应秉承“跨界”和“共同体”的生态思维;在理论层面,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则应该实现范式的转换。

(二)利益是职业教育政策的生态因子

1. 职业教育政策是职业教育场域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利益”是教育政策运行的根本逻辑。著名的政策科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关于“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的表述,恰切地把握到了政策的核心,突出了现代政策内在的本质要素。在这一定义里的“价值”,其实就是利益。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职业教育政策本质上关涉的是职业教育利益,是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集中反映,职业教育政策的实践就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进行调整和分配的过程。

一般而言,教育政策是个人教育利益和社

会公众教育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即公共政策本质上应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各种利益相关者将自身的利益需求输入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10]这也恰如美国著名政策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所言,“政府经常声称,其任务是服务或者增进公共利益。”^[11]对利益的诉求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一切行为的动因。职业教育政策对教育利益的分配,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有不同的方式。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政策的制定只能是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符合统治阶级的私利。例如,古代的学术官守、学在官府等,剥夺了被统治阶级的受教育权,学校教育以教授统治的权术为核心,职业教育被排斥在“正统”教育范围外,而以“家传世学”的形式在民间得以保存和传续。

2. 职业教育政策过程利益关系复杂

在大量多样化的因素相互作用的意义上说,复杂性是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12]现代社会教育政策的公共性利益取向,是教育政策存在的合法性前提,也是必然前提。职业教育政策的利益取向,从主体上说,除了公共教育利益之外,并不排斥其他教育利益的存在。教育利益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同主体对教育利益的诉求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和对抗,这就需要教育政策决策者秉承某一原则对这些群体复杂的教育利益诉求进行平衡、协调和分配。

职业教育政策过程利益复杂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职业教育利益类型的复杂性上。表面上看,职业教育利益在教育领域主要体现在教育权利的获得,教育机会的获取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几个方面。除此之外,源于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教育利益具有其他公共政策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这决定了对教育政策的理解,不能将一般公共政策作简单演绎。区别于一般政策,职业教育政策活动有其内在的逻辑特点。原因在

于职业教育政策所规制的教育活动的对象是人,职业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职业教育活动面对的是人的身心发展和技能的提升。所以,不同于一般公共政策,职业教育政策对受教育者进行的利益分配通常表现为身心发展的机会和资格认定等隐性层面,而非传统认知的金钱、物质、权利等显性利益。

3. 职业教育政策是不同利益间的妥协

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职业教育利益冲突的存在,职业教育政策怎样整合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偏好,是决定教育政策效率永恒的课题。职业教育政策的决策空间会受到利益、价值判断、意见和感知的挤压与影响。政策相对人(目标群体)会根据各自的能力、关系和利益来影响与操纵决策过程,这种情况从问题解决过程的最初开始,就伴随着整个决策过程,职业教育政策就是不同利益间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正如多元主义(Pluralism)所理解的那样,公共政策过程“本质上就是众多利益团体代表各自成员的利益,进行利益聚合与表达,通过竞争、博弈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和均衡的过程。”^[13]

职业教育问题所关涉的群体之广,利益关系之复杂,是其他类型教育政策难以比拟的,几乎每个人和组织都以某种方式与职业教育发生联系,这也决定了职业教育政策利益群体的复杂性。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策决策中,教育政策相对人介入教育政策决策被看作是政策民主和公开透明的一种标志。比如,听证会制度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说法。所以,作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客体,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群体(政策相对人),或者说职业教育政策的利益相关者,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接受政策影响与规制的,他们的影响甚至渗透到政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决策。在政策过程中,大量的政策活动与在各式各样的参与者之间建立和维持秩序有关。看起来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决定。^[14]这是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一种政策创新(Initiative)。^[15]

三、追问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取向的内涵

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从理论上而言,源于生态学生态位理论,政治学治理理论,哲学主体间性理论以及政策学政策网络理论等,这几个学科理论的启发给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多学科视角的养分。更重要的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的到来,亦即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时代基础。

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基于事实层面的生态性。前文已述,由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殊属性以及职业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对职业教育政策生态的理解,至少涉及三个维度:教育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以及教育政策系统等。教育内、外部环境构成教育政策生态的宏观和中观生态系统,而职业教育政策自身的系统则构成微观的生态系统。这是基于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复杂生态关系作出的事实判断。二是基于价值层面的生态性。职业教育政策是现代国家行使教育职能的方式与途径,是治理职业教育事业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国家通过职业教育政策表达国家的意志,并通过职业教育政策分配教育权利、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6]作为基本“善”,生态性是职业教育政策的一种内在属性和价值追求,是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理应把和谐、可持续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思维作为其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本文拟将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取向定义为,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所表征的生态特质,以及在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因为利益相关者的多元性和环境的复杂性,而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政策行为主体具备系统化的思维,以

坚持和彰显职业教育共同体内涵的价值取向。因而,对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意味着动态平衡

生态学领域有一个十分有益的概念——生态平衡。所谓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状态,其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接近相等,在外来干扰下,能通过自我调节和人为控制恢复到原初稳定状态。当外来干扰超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不能恢复到原初状态谓之生态失调或生态平衡的破坏。^[17]生态平衡本身也表征着平衡的动态性,是事物由平衡到不平衡(平衡被打破),再到平衡的过程。职业教育政策生态的动态平衡体现的是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诸如政府、学校、企业、学生、行业等主体,作为职业教育政策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与环境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生态关联。它们之间的能量交换和信息沟通,直接影响着政策的生态平衡,任何自然力和人为活动对政策生态系统环节以及环境的影响,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利益结构的变化,整体利益的结构被打破,在职业教育领域呈现出利益多元的状态。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18]作为独立的利益单元,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逐渐有了“发声”的愿望。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精英决策的传统,以及政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导致了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在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失语”的被动存在,民意表达的途径和利益诉求的通道被堵死。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中所企及和主张的政策目标,通常也只能最终落入“有共识、难落实”的政策实践中,导致政策允诺落空。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自身的跨界属性以及双元育人的办学格局,客观上要求职业

教育资源的融合与重构。职业教育政策主体(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存在,以及对利益的伸张需求,客观上改变着、并打破了以往职业教育政策固有的利益生态环境,以及主体之间基于能量交换的生态平衡。作为一个系统,为了使之正常运转,需要通过关系的重构保持生态系统的再平衡。冲突着的利益之间的一系列妥协保持了系统的动态平衡。

另外,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动态”,并不是否定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需要结构和秩序,而是要否定利益结构的固化;也不是要否定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是在尊重政府地位的同时,要突出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打破以往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中封闭的环,从以往追求固定的结构,到追求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

(二)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意味着多元共治

职业教育利益主体的多元,决定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秉承生态原则,从单维管理走向多元共治。制度经济学有关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已经证明,个体理性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实现。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的是公共利益的损害。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善性使社会合作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处于脆弱和不稳定状态之中,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背离变成经常性现象。^[19]因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有关职业教育多元共治问题探讨的前提,就是要将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职能以及各主体间的相互机制纳入制度框架。通过政府规制治理社会,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强制与规范还是来自市场主体的服从与协助,都要依赖一个明确的制度框架。^[20]应当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把支离破碎的道德环境,重新组成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统一体。”^[21]在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合理分配职业教育利益相关方参与职业教育共同治理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协商与博弈实现各种权利、价值和利益之间

的平衡。

(三)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意味着自我创新

职业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教育政策的自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职业教育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转化。“进入新时代,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22]而反思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则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态思维来审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也同时进入新时代,这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最大的生态环境。当前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对优质、多层、多样的职业教育的需求,解决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不强、内涵建设不优、体系建设不活的矛盾。新时代职业教育面临着体量大而不强,产教合而不深,体系框架形成而不完善等问题。职业教育政策生态环境的变化,终将导致利益格局和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角色等都将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也要求职业教育政策在面对这些变化时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与手段。在新时代这样一个宏大的政策背景下,随着政策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职业教育政策亟须创新。

1. 职业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创新

传统意义上,对职业教育政策决策主体的认定,往往局限于官方决策者,主要是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机关。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利益结构的变化,职业教育政策参与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需要对这些参与主体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身份进行重新审视,有必要去拓展以往职业教育政策主体仅限于官方决策者的观点。基于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的观点,职业教育政策决策主体还应该包括非官方参与者,如企业、学校、行业、学生、利益集团、政治党派、大众传媒、思想库和公民个人等。

他们作为体制外的力量,通过游说官方决策者来施加压力,从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23]非官方参与者介入职业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影响决策过程,在保证职业教育政策客观公正和职业教育政策目的达成的有效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策决策模式的重大进步,意味着政府在治理方式方面的重大转变。

H.K. 科尔巴奇(H.K.Colebatch)曾经对政策与治理进行过精彩的论述:在政治科学中,政府除了要作出决策并且运用国家权力执行决策外,还要花时间与非政府组织沟通。来自政府外部的参与者越来越被看成“下赌注的人”,他们有权力参与决策甚至执行决策。这种重新思考的结果是,逐渐地,政府的任务不被看成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而是编制与其他一系列参与者一起的行动。^[24]他认为,治理(Governance)这一全新术语的使用,政策决策与执行方式由垂直向水平的转变,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行为方式,意味着现代政府政策已然成为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一个并不必然具有主导地位的博弈者。从垂直维度看政策,是权威化的决策过程,对政府而言,“治理”也许表现为一种通过直接使用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目标的方式。从水平维度看,政策是一个结构化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从“统治”转向“治理”也许表明了一个认识,即当选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是博弈中的博弈者,而不是火车的驾驶员。^[25]

2. 职业教育政策内容创新

职业教育政策内容的创新,关涉职业教育关系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要求政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工作要“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正式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这实际上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旨在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6]例如,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坚持《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的职业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完成“三个转变”(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育人中关键地位,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机制,管办分离,建设多元办学格局。

(四)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意味着以人为本

职业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具有其他一切公共政策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特征。而职业教育政策区别于其他公共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职业教育政策既面对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还要关注和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既要使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和技能,还要促进其身心得发展,这是职业教育政策规制对象的特殊性之所在。职业教育政策所调整的利益主体的复杂性背后,其根本任务是人的发展。所以,职业教育政策并不是一般公共政策简单演绎的结果,职业教育的政策活动有其内在的逻辑特点。这种特殊性是我们认识教育政策本质的一个核心方面。^[27]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政策在分配职业教育领域复杂利益的同时,根本着眼点应当是本着以人为本的取向,注重接受教育个人的身心发展机会、条件和资格的获得与认定,并在职业教育实践中为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创造条件。

职业教育政策生态性价值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决定了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不是“目中无人”的教育,只是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的教育,而同时要关注人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在院校接受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的学生,让学生有发展。与此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来覆盖更多群体,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有一组数据说明了我国开展职业培训的必要性:我国现有2.8亿农民,9 000万残

疾人,7 000 万退役军人。这些群体的存在,要求我们除了正规教育的学校职业教育外,还应该有非正规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的职业培训,以及以自学和在线学习等形式而存在的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为就业市场中非利好群体提供多样化的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 [1]杨志成.新中国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11.
- [2]陈子季.用系统思维下好“职业教育一盘大棋”[N].中国教育报,2020-12-03(1).
- [3]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M].张旅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9.
- [4][5]陈丽鸿,等.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62.
- [6][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21.
- [7]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
- [8]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4-05-05].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68517.htm.
- [9]姜大源.职业教育要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

- [10][13][23]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111,72.
- [11][15]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第五版)[M].谢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60,65.
- [12]斯图亚特·S·那格尔.政策研究百科全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11.
- [14][24][25]H.K.科尔巴奇.政策[M].张毅,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43,103,104.
- [16]彭华安.教育政策的伦理性:缺失与回归[J].中国教育学会刊,2011(3):35.
- [17]邹冬生,等.生态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16.
- [19]潘伟杰.制度、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7.
- [20]宋功德.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1.
- [21]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M].潘大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11.
-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 [26]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4-05-05].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19197.htm.
- [27]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42.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ao Junming, Liu Ping

[Abstract] As a type of education, the cross-border na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systematization and complexity of its interest subjects.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scope and object of regul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has completely broken through the “pure” and “education-based”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general sens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ontology and the sorting of the na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t is found that ecological nature is one of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leads 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being suppressed and affected by interest and value judgment, which objectively requires the subj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o have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therefore the ecological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unity connotation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highlighted in the proc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he ecological valu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means that the 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dynamic balance, multiple co-governance, self-innovation and people-oriented.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ecology; value orientation